

遼
寧
文
史
資
料

第 八 輯



辽宁文史资料

第八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辽 宁 文 史 资 料

Liaoning Wenshi Ziliao

第 八 辑

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 120,000 开本: 850×1168 $\frac{1}{32}$ 印张: 4 $\frac{3}{4}$
印数: 1—4,3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鸿宾 责任校对: 宋玉培
封面设计: 赵多良

统一书号: 11090·119

定价: 0.62元

目 录

缅怀杜重远同志·····	卢广绩 (1)
关于百十一师锄奸和起义的回忆·····	彭景文 (11)
东三省兵工厂·····	沈振荣 (47)
略述东北大学·····	李宗颖 (65)
东北中学简史·····	舒毅敏 (86)
对奉天公立文学专门学校的回忆 ·····	韩魁武 遗稿 韩开复 整理 (94)
伪满大同学院杂忆·····	尚允川 罗 英 (101)
营口炉银初探·····	丁叔健 撰稿 崔化桥 整理 (110)
解放前安东的油坊业·····	宋瑞宸 (121)
附载：我所知道的张作霖和张学良·····	孙达生 (131)

缅怀杜重远同志

卢广绩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是年十二月，我由西安去重庆，适杜重远同志的夫人侯御之携三个孤儿由新疆刚回到重庆，寓居胜利大厦。我前往访问，相见流泪，得知重远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毒害至死的经过。

随着岁月的流逝，收集和整理重远同志的生前事迹，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国的事迹，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把同重远同志在一起的往事整理出来，有遗漏或讹误之处，请与重远有关系的同志和朋友加以补充和修正。

一、爱国救国、创办实业

辛亥革命后，我们先后都考入奉天两级师范学校。重远在附属中学，我在初级师范。我们在学时期正是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借“日英同盟”参战，进占原德国侵占我国的青岛和胶州湾，并乘机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强迫签字。当时袁世凯任总统，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竟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于一九一四年五月九日签订了这个卖国条约。当时，我们学校政府的严密监视下，不准出校门，参加抗议签约的示威活动。同学们就在校内写墙报、开会，表示我们的愤慨，在这次宣传活动中，我和

重远相识，但无更多的接触。不久，重远留学日本。在此期间，日本对中国多次制造种种借口、挑起衅端、节节进逼。特别对我东北地区更是得寸进尺。例如在延长联结吉会铁路问题、南满和北宁铁路并行线问题、临江设领和郑家屯交涉等问题上，不断地制造事端。这一系列的事实激起了留日中国学生的义愤，特别是东北籍的留日学生，慨于亡国之祸迫在眉睫，遂组织同学回国，向各级政府呼吁和向各界人民宣传。重远参加了这次归国宣传活动，到各地作宣讲。他以激昂慷慨的言辞激励各界同胞抵御外侮，许许多多听众都当场为之感动而落泪。在这次宣传活动中，重远同志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一九二三年，重远同志学成归国，当时以留日学生头衔，想当官是很容易的，但他有感于我国工业落后，决心投身实业。因为重远在日本仙台高等工业学校学的是陶瓷，又见于沈阳尚没有机制陶瓷工业，乃创建一个机制陶厂，即我们都熟知的“肇新窑业公司”。杜重远实为东北机制陶瓷工业的首创者。当时，重远做为一个青年学生，没有什么社会渊源，要创办实业，筹集资金，谈何容易。他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凭借旧日老师，朋友的支援，才打下了基础。一九二八年张学良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励精图治，积极兴办实业和教育。重远所创办的企业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并投资十二万元，工厂始得日益发展。在此期间，重远被推选为奉天省总商会的副会长。他援引一些进步人士参加商会工作，（高崇民同志曾在这一时期内担任商会总务长襄助工作）多所兴革和建树，并敢于同当时的坏人恶事作斗争，使当时沈阳工商界呈现出一种新气象。

二、奉天总商会时期，重远和我的联系

在重远同志任奉天总商会副会长时期，有一件难以忘怀的

往事。

一九二八年冬，奉天省政府未同商会协商即命令给商民附加警捐，这是在商民应负担的捐税以外的一种额外负担。当时商民坚决反对，群情激愤。重远同志同情并支持商民的意见，认为政府不顾商民疾苦，随意摊派捐税极不合理。商民罢市、上街游行，要求政府收回成命。重远同志走在商民示威请愿队伍前面。这使奉天省政府的负责人惊惶失措，认为杜重远要领导商民造反。于是夸大其辞，上报到司令长官公署，重远遂因此被省政府解除了副会长职务。这在沈阳工商界人士中得到了极大的同情，重远的声望益隆，直到今天有些老年工商界人士谈起此事还对重远称赞不已。

我在重远同志任奉天总商会副会长时期，任奉复印版石矿公司经理。矿山在复县，工厂设在沈阳，加工制造国产的印刷石和大理石。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政府奠都南京，孔祥熙任南京政府工商部长。为了点缀新政，拟在上海举办“中华国货展览会”。孔曾给张学良发电，希望奉天省能参加这个展览会。张学良将军令商会杜重远负责筹备。因为我是国货厂商，遂被邀参加筹备工作，并被推派为奉天总商会代表前往上海参加展览会。这是我同重远在工作上发生联系的开始。许多筹备工作都同重远商量和研究。他处理事务明决爽快、严肃、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到上海后除参加“中华国货展览会”外，还出席当时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商会联合会。在留上海的三个月中，我经常与重远函电往来，在许多方面，我都得到了重远同志的帮助、指导。那时东北还未易帜，同南京有些往来，处于半独立状态。我年纪轻，事故经验不足，最后能够完成任务，这和重远同志的指导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一九二九年春，重远同志被奉天省政府解除他的职务后，

省政府即委派金恩祺和我暂行代理奉天总商会会长职务，并负责筹备改选事宜。我对这种工作很生疏，在许多方面都随时得到了重远的帮助和指导。重远同志当时虽然遭受省政府中一部分人的排挤和倾轧，离开了商会，但张学良将军深察他是一个有用的人才，倍加器重，乃委以司令长官公署外交秘书职务，处理对日本的外交事务，同时对他经营的企业给予了大力支持。

三、共同出席“国民会议”

一九二八年冬，张学良表示拥护国民党南京政府实行易帜，即把从前悬挂的五色国旗改为青天白日旗，同时把奉天省改称为辽宁省。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我和重远做为辽宁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我省代表分别到江南各地游览参观。我同重远俩人单独由杭州去莫干山，后又到无锡游览惠山和太湖。我们在游山玩水中想到东北在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下危急万状，真是肝胆欲裂。联想到张学良将军家仇国难集于一身，虽有励精图治的愿望，但体弱多病，怎能应付东北这一发千钧、朝不保夕的危难局面。为此，我们游兴顿减、意趣索然、忧心忡忡。当时，就我来说，对国内政治情况还很暧昧，只就东北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颇有感受，急于寻求对策。对于从中国的全局出发，探讨救国之策，缺乏远见。我们就如何发挥“东北国民外交协会”的作用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建于一九二九年，并在东北各省、市、县设有分会。我们认为，应当充分地运用这个组织，建立和健全它的领导核心，更好地发挥宣传和组织群众的作用。此后，我们又同阎宝航、王卓然、王化一会见，大家一致主张，首先必须使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振奋起精神，勇

敢地肩负起挽救东北危亡的重任。重远每谈起这些问题，总是那么激动，表现出高涨的爱国热情。

四、“九·一八”事变后，重远同

志的抗日救国活动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南满铁路柳条沟铁路被炸事件，借口侵占了沈阳。事变发生后不久，我和重远都到了北平，我们共同感觉到：对日本的这种疯狂侵略行径不能缄默，尤其对张学良接受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不能无动于衷。不久，我们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组织，扩大抗日救国宣传工作，指导和援助在辽宁的抗日义勇军，同日本侵略军进行顽强的斗争。重远同志积极参加这个组织。他驻在上海同京、沪各地同情和支持抗日救国的爱国人士加强联系。上海和内地人民同东北人民一样，抗日意志无比坚强，对南京政府的拱手让人、开门揖盗的不抵抗政策极为愤慨。因此，不久就爆发了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淞沪抗日战争。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日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重远同志此时驻在上海，同上海工商界、文化界和其他社会人士往来频繁，同各方面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作宣传鼓动工作。在重远同志的言传身教下，我逐渐认清了为争取抗日救国的最后胜利必须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所以，不能只局限于某一地区的工作，要争取国内各方的同情和支持。在救国会中重远同志肩负主要责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五、在热河后援会和长城抗战时期

一九三二年冬，长城抗日战争序幕揭开了。在北平成立了“东北热河后援协会”，由朱子桥将军领导，得到了各界人士

的积极支持。尚记得国民党政府曾派行政院长宋子文和上海救国会团体代表黄炎培等亲到北平，并去热河部署战事。当时重远同志随同前往，担任战地宣传工作，组织青年学生参加抗战工作。但由于防御力量不足，为时不久，热河即陷入敌人手中，战争已逼近长城各口。前方的战士英勇抗击日敌，后方的国民党政府毫无抗战的诚意，不久就签订了《何梅协定》和《唐沽协定》，华北的局面突变。因此，我们支援长城抗战的东北热河后援协会的工作也就不告而休了。不久，张学良被迫交出军权，出国考察。我们抗日救国会也处处受到限制和打击，难以继续工作。重远同志此时在上海除积极参加各界抗日救国宣传工作之外，还经常为《生活周刊》和以后的《新生周刊》撰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呼吁停止内战，许多青年阅读这些文章后，激发起爱国热情，参加了抗日救国的工作。

六、为“闲话皇帝”案被捕入狱

重远在上海同文化界人士如邹韬奋等创办《生活周刊》宣传抗日救国，颇受广大读者欢迎。不久，《生活周刊》被勒令停刊，韬奋被迫出国，重远就代替韬奋，将《生活周刊》改为《新生周刊》，重远任《新生周刊》的发行人。一九三五年春为《新生周刊》上刊登《闲话皇帝》，上海日本总领事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提出抗议，认为这是对日本天皇的侮辱、大不敬。认为重远是发行人，负有责任，应严予惩办。当时，国民党政府竟徇日本领事的无理要求，把重远投入上海漕河泾监狱，判处一年多徒刑。全国爱国人士对此判决极为愤慨，并由重远同志的好友高崇民等提起上诉，但竟被搁置不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从国外回沪得知重远已被移到苏州监狱。翌日，我会同崇民同志前往苏州监狱看望重远。此时，他的身体虽然消瘦，但

精力充沛，谈到国内局势时，对抗日救国的最后胜利信心百倍。对我离开国内一年多的国内形势的变化作了细致的解说和分析，同时对我个人当时的消极想法（我当时曾有离开抗日救国岗位去经营中美贸易，筹措救国基金的想法和意图）给以严肃的批评和热情的鼓励，使我感到朋友的真挚情谊。至今，这一切仍留在我的脑海中，不能忘也不敢忘却。一九三六年春，重远同志因病由监狱迁到上海虹桥疗养院休养，不时过从，知道几年来重远在上海结识了许多进步的文化人士。重远从不把挽救中国危亡和求得抗日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他劝我要努力学习政治理论，争取进步，并为我介绍进步的青年朋友帮助学习，使我能跟着进步朋友一道前进，不致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从重远身上，我获益非浅，此生难忘。

七、抗战时期，作支援前方的工作

一九三六年冬，震动全国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虽然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恩将仇报，使张学良将军为此失去了自由，至今还过着被监禁的生活，但是，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安内攘外”政策，因事变而不得不宣告结束了。国内出现了暂时和平的局面，也使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在芦沟桥挑起战火，八月十三日淞沪战争也开始了。全民对日抗战局面由此展开了。此时，重远同志留在上海积极参加淞沪地方支援前线的工作。当时，国民党政府在支援抗日战争的口号下，曾拟发行“救国公债”除中央建立总的机构外，各省、市先后都成立救国公债分支劝募机构。东北地区虽然沦陷，但流亡关内的东北军和东北人士还有几十万，因此也成立救国公债东北劝募筹备委员会，由中央派朱子桥任主任，杜重远任副主任，我参加筹

备工作。当时由于重远同志还参加其他工作，因此关于劝募救国公债一事即由我暂代，并随时请示朱子桥将军，以后因战局变化，停止劝募。就在这时，重远同志为建立长期抗日根据地同盛世才所派的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张元夫一同去新疆。回来后，重远同志曾向有关方面汇报新疆情况和盛世才的态度。那时盛表示同情抗日，大家都为之深受鼓舞，认为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考虑，有必要在新疆建立后方根据地，并打通国际路线。由于我们警惕性不高，竟同反复多变，狡猾残酷的盛世才建立了关系。

迨上海、南京先后陷落后，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我们也先后撤退到武汉，得以同重远同志经常在一起共商抗日救国大计，重远同志对此实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八、对国民党走狗周天放的斗争

一九三七年冬，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退到武汉，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迁在鸡公山上的东北中学，原为张学良将军创办，专为收容逃到关内的东北籍的青年学生，培训抗日救国、打回老家去的基干和后备力量。该校于“九·一八”事变后，在北京成立。华北沦陷后又迁到鸡公山，孙一民任校长。“西安事变”后，就由原校董会来维持。当时，国民党政府所豢养的东北籍的国民党员周天放没有和校董会事先协商，竟以湖北教育厅的名义直接委派校长抢夺学校的领导权，遭到全校师生数百人的严厉拒绝。当时鸡公山的管理局竟扣押学校教师数人，尤激起全校师生的愤慨。师生全部撤到武汉，同时向驻在武汉的教育部和武汉地方政府请愿、示威游行，得到武汉市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的同情。重远同志坚决主张同周天放作不调和的斗争，清算总帐，斗争到底。这使周天放深为恐惧，

只好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和湖北地方政府出面调处。甘心为周天放充当牺牲品的赵雨时一到鸡公山就遭到学生们的强烈反对，狼狈而逃。这次斗争大灭了国民党走狗周天放之流的威风，使其不敢为所欲为地迫害东北人士和青年学生。

我还记得当时东北中学的师生都住在武昌明日桥，每次重远同志同我们商谈事情或给学生讲话，都能增强我们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因为他的讲话都是语出肺腑，真挚动人，使很多青年受益非浅。

九、去新疆的经过和最后会见

一九三八年春，我由武汉来西安，虽与重远同志不在一起，但重远同志两次去新疆都经过西安，事先总有电报函告。记得一九三八年，他第一次去新疆路过西安，乘飞机停留之机，重远曾告诉我，他决定在新疆协助盛世才创办新疆学院，培养抗日和建设人才。

重远第二次携眷属去新疆，经过西安时，我们也曾在机场会面。重远讲，他决定暂时不回来，在新疆工作一个时期。不料此匆匆一面竟成永别。当时，在西安机场，重远同志着重谈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重要性。

回忆我同重远自一九二八年开始一直到一九三八年最后在西安机场别离，十年之间除我出国考察一年外，总是在一起工作。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我们一同流亡关内，一同参加抗日救国工作，一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中经热河失守、长城抗战、华北撤退，尤其是一九三七年烽火漫天的最困难时期，我们都在京沪，我们常同乘卡车或火车，夜里往来于京沪之间。有时遇敌机袭击，共同伏在田野间躲避，有时遭狂风暴雨，相互依偎湿透衣襟。至今回忆起来，恍如昨日事，

重远同志以满腔热血，一片赤心，为抗日救国、为复土还乡，奔波在遥远的边疆，乃竟因把毫无人性的豺狼盛世才当成可与共事的朋友而遇害。重远在新疆遭难是在一九四三年，他还不到五十岁。现在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如果重远同志地下有知的话，是会含笑于九泉的。

关于百十一师锄奸和起义的回忆

彭景文

百十一师原是东北军五十七军的一个完整师，也是东北军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从国民党蒋介石控制的反动营垒中走向革命的一支人民武装力量。当时我任该师六六六团团长，对于这个师的锄奸斗争和起义经过有所了解，现将这个师这段历史回忆如下，供研究我党历史和中国现代史参考。但由于事过境迁，有许多事情记忆可能有出入，冀望当年了解情况的老同志斧正。

有利的抗日形势

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后，全国进入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东北军五十七军百十一师奉令到河南进行整编，这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东北军抗日，派丁充、王再天（东北讲武堂十一期毕业）等同志到百十一师向常恩多师长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争取民族独立等革命道理。

“西安事变”时，常师长受过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红军参谋长叶剑英等同志的熏陶，曾经表示拥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接受《抗日救国八大纲领》。因此，他们来后很受常师长的欢迎。并使常逐渐地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开始倾向革命。

一九三八年夏，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将原在五十七军中的“工委”改为百十一师工作委员会，由张魁平同志担任书记，同时派谷牧、张文海、李欣等同志加强百十二师的“工委”工作。

当时百十一师全体官兵，在常师长领导下抗日情绪很高。为了开展抗日斗争，他曾令三三三旅参加台儿庄战役，英勇杀敌。此后，他率领全师进入鲁南，并在鲁南滨海广大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百十一师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影响下，广大官兵抗战热情极为高涨，有许多要求进步的官兵，向中国共产党靠近。

一九三八年，党决定在百十二师中发展组织，由张文海同志和谷牧同志介绍该师三三四旅六六七团团长方毅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万毅调到百十一师任三三三旅旅长。一九三九年春，在我党培养教育下的常恩多师长，也提出入党要求。经中共山东分局的认真讨论，决定由书记郭洪涛同志为介绍人，接受常恩多同志的入党要求，并定为特别党员，受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直接领导。至此，百十一师名义上是东北军五十七军领导，实际上已成为我党在国民党部队中直接领导下的一支抗日劲旅。从此之后，百十一师在常师长指挥下，各团进行了大小战斗多次，在消灭日寇、汉奸和土匪，破坏铁路、公路等斗争中极为活跃。尤其六六二团在六六六团配合下，攻克诸城县境的伪军张步云部的枳沟重要据点，歼灭其伪三旅大部，打死打伤、俘虏近千人，缴获大批武器，给入侵之敌以沉重打击。又如三三三旅出色地活跃在南至陇海铁路，西至津浦铁路之间，进行破坏铁路斗争，并配合八路军截断其诸、莒、沂出路。歼灭临沂县属相公庄伪军据点全部敌人。

百十一师广大官兵活跃在抗日的战场，极大地震动了国民

党中的反共分子。特别是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早在常恩多师长移师部于莒县时，沈就曾向常提出共同负起反共责任，遭到常的拒绝，沈对此极为不满。但一时间又抓不到常与共产党的联系，只好待机而动。并在暗中不断地制造反共摩擦。

现在情况不同了，百十一师的抗日活动地区越来越广泛，抗日要求也越来越高，再不能无动于衷了。为了对付中国共产党在百十一师中的影响，国民党反动派把百十一师的师、团政治处的机构加以充实，他们梦想分化、瓦解部队中的进步力量，争取广大官兵“效忠党国”，决定以国民党百十一师特别党部名义，发动一次“集体入党”，规定以团、营为单位，分别在各地举行入党仪式。上至师长、团长，下至伙伕、马伕都得参加。并按着官兵花名册，填报党员名册。特工人员说：

“今后大家都是国民党员了，应该按照宣誓所说的，忠党爱国，信仰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事后，广大官兵都骂道：“刮国民党竟扯蛋，越忠党就越亡国。”

一九三九年夏季，日寇集中两个半师团对鲁南进行“大扫荡”，国民党贪官污吏，多半逃跑投敌。百十一师国特政治部，从主任到政训员都怕得要死，纷纷要求到五莲山区临时后方留守处躲躲。常师长一律批准，让他们走开，以免在反“扫荡”中碍手碍脚。在反“扫荡”斗争中，常师长亲自领导全师官兵与敌人展开决战，并组织战地工作队（即后来我党领导的百十一师战时服务团前身），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并发行《战斗快报》，鼓舞部队士气，从而使这支抗日武装不断取胜。他们首战板泉崖，再战上河，大量杀伤敌人，缴获物资也很多。在九里坡一役中，日寇遗尸数十具，丢弃被击毁的汽车十余辆。在反“扫荡”斗争中，百十一